

元代靖州路建置与地方治理探蠡

刘 源

提 要：元代靖州路由于其辖境毗邻少数民族地区，相对于一般路州，在湖广行省地方治理中的地缘位置较为特殊。有元一代靖州路的行政建置嬗变不定，其变迁伴随着湖广行省民族区域秩序的不断变更。元顺帝一朝曾针对靖州路与思州安抚司就黔东南洞民地区的隶属进行划境。通过对相关问题的辨析亦可见元廷利用土官与路州辖区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巩固民族区域的地方治理。

关键词：元代 湖广行省 靖州路 思州安抚司 民族地区

元代靖州路位于今湖南省西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一带，其地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接壤，位处黔、湘、桂三地交界。靖州自宋代即为通往广西的驿道要冲，又毗邻少数民族地区，地缘位置显要。自元朝大一统王朝体制的建立，靖州遂成为湖广行省治下路一级行政单位。有元一代靖州路行政建置嬗变不定为学界所关注，王颀最先指出《元史》关于靖州路建置变迁记载之疏^①，曾昭柱^②与傅林祥^③均就靖州路建置的变迁进行过梳理。元代湖广行省境内地方行政结构相对特殊，除路、府、州、县地方建置外，尚有广大地方民族区域由宣慰司、安抚司，以及地方土官所辖，而靖州路位处行省境内路州与土官辖区交界，其建置关涉地方行政与民族地区治理，前贤未及做进一步考察。有元一代靖州路行政区划范围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但其地缘位置的特殊又屡屡为元廷所关注，对于认识元代湖广行省地方行政与民族地区治理颇具意义。本文即拟尝试对其中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元代靖州路的建置变迁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忽必烈命右相阿里海牙挥师江陵（今湖北荆州），进入南宋荆湖北路境内。此时元朝虽已占据绝对优势，然而元军在辰州（今湖南沅陵县）、沅州（今湖南怀化以西）、靖州、镇远（今贵州镇远县）等地的战事并不顺利。靖州一带的南宋守军联合武冈（今湖南武冈市）等地少数民族“分据扼寨”对元军的抵御尤为激烈，同时还有来自思州（今贵州东北部沿河至凤冈一带）与播州（今贵州遵义一带）地方武装的兵力增援。^④虽然至元十三年靖州知州入降元军，然直到至元十六年韩国宾出兵靖州^⑤，才初步完成对这一地区的招抚。

宋代靖州又称“诚州”，辖永平、会同、通道三县及四寨，其时该区域分布“十峒”^⑥蛮

① 王颀：《〈元史·地理志〉资料探源》，《历史地理》（第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24页。

② 曾昭柱：《元王朝在靖州的统治》，《怀化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

③ 傅林祥：《元代靖州路变迁》，《历史地理》（第2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55页。

④ 参见《元史》卷9《世祖纪六》，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182页；《元史》卷165《朱国宝传》，第3877页。

⑤ 参见黄溥：《中大夫延平路总管韩公墓志铭》，《金华黄先生文集》卷35，“四部丛刊初编”集部，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469册，第359页。

⑥ 宋代“十峒”范围包括今湖南靖州、通道、会同县一带，贵州黔东南州黎平、锦屏、从江县东北以及广西三江一带，详见廖耀南：《黎平锦屏从江长官司考略》，《贵州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

夷，集中于辰州、沅州、靖州以及广南西路允州（今贵州黎平县东南）、中古州（今贵州榕江县）等地^①，宋廷将这些地区的“溪洞之民”划入州县管辖，广设城寨。靖州则与黔东南洞民联系尤为紧密，《贵州图经新志》则记载宋代曾于当地设置潭溪、洪州泊里等5处军民长官司以管辖当地洞民，隶属诚州。^②宋朝曾在这一区域广募“峒丁”充任弓弩手，由朝廷给予耕地。到南宋嘉定年间更将各民族人口划分为“省民”与“熟户”“山徭”“峒丁”等类，施行计口授田。^③宋代范成大曾对湖广西南形势有如此描述：“南方曰蛮，亦曰西南蕃。今郡县之外，羈縻州洞，虽故皆蛮地，犹近省民，供赋役，故不以蛮命之。过羈縻，则谓之化外真蛮矣。”^④宋廷的举措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该地区的统治，致使元军遭到地方守将与人民异常激烈的反抗，战事漫长而艰难，也影响了元朝对该地区少数民族的治理。

有元一代靖州路行政建置曾经历数次变迁，如下表所示：

名称	隶属	设立时间	史料来源
靖州（散州）	江陵府	至元十二年	洪武《靖州志》、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19
靖州（路）安抚司	江南北道	至元十二年	《元史·地理志六》 《事林广记》卷4《郡邑类》
靖州路		至元十三年	
靖州路	湖广行省	至元二十九年	《元史·世祖纪十四》
靖州	辰州路	至元三十一年	《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卷19
靖州	沅州路	元贞元年	《元史·成宗记一》
靖州路	湖广行省	延祐四年	《元史·仁宗纪三》
靖州			未详
靖州路	湖广行省	至治二年	《元史·英宗纪二》
靖州军民安抚司	湖广行省	至正九年	《元史·达识帖睦迺传》 《元史·百官志八》

《元史·地理志》对靖州路的记载缺略较多，明代地方志对于元前期靖州路建置记载亦与《元史》抵牾，如明洪武本《靖州志》以及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均记载至元十二年（1275）以靖州为散州^⑤，并未言及至元年间有靖州路之设，《元史·地理志》以及明初成书的《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则缺失散州之设的记载，仅言靖州曾设安抚司与路总管府。^⑥元朝在平宋初期

① 参见《宋史》卷88《地理志四》，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2196、2197、2241、2246页。

② 参见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7《黎平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巴蜀书社，2006年，第1册，第78页。

③ 参见《宋史》卷494《蛮夷传二》，第14196页。

④ 范成大著，胡起望等校注：《桂海虞衡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206页。

⑤ 参见洪武《靖州志》不分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洪武抄本，第10页；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19《靖州》，“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下册，第1565页。

⑥ 参见《元史》卷63《地理志六》，第1527页；刘基等撰：《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卷19《靖州》，“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586册，第259页。

于江南广泛设置安抚司，当时的安抚司是带有临时性的军政管理单位，主要负责稳固地方秩序，随着湖广行省地方行政体系的逐步建立才逐步转化为地方行政建置。事实上靖州、沅州、辰州、武冈地区多溪洞族群分布，加之当地南宋遗留兵力的顽强抵抗，在当地设立安抚司进行镇抚实为要务，即便入附之初元廷曾设靖州为散州，但考虑到当时荆湖一带整体的地区形势，散州建置当不会维持很久。至元十二年由赛典赤·赡思丁主事，云南行省率先“命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并听行省节度”^①。并广置州县，嗣后元朝在江南地区广泛实施，各地安抚司逐步为路、府、州所取代^②，辰州、沅州等地所设安抚司均相继改为路，靖州作为南宋时西南望郡下辖三县四寨，自然概莫能外。

元代靖州路治今湖南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仍辖三县，相较宋辖区的变化在于省入四寨之地以及不再直接管辖黔东南各军民长官司及洞民。自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四川行省讨平“九溪十八洞”，元廷下令对其族群管辖采取“大处为州，小处为县，并立总管府，听顺元路宣慰司节制”^③。其时黔东南洞民地区同样归入顺元路宣慰司辖境，元廷在当地设立了古州八万军民总管府，这一时期的顺元等路军民宣慰司辖下，包括黔东南洞民区域，实际上属于四川行省管辖范围。靖州路据《元史·地理志》载有户二万六千五百九十四，口六万五千九百五十五，对比宋代靖州辖一万八千六百九十二户^④，到元文宗时期靖州路人口确有不小的增长，但靖州路人口规模在湖广行省中部地区路一级行政区划中始终处于底端。有元一代靖州路行政建置的嬗变不定集中表现在路与州之间的频繁变更，除却所辖各地与人口规模，与周边区域秩序的变迁存在直接联系。

至元二十九年（1292）湖广行省与河南行省进行辖区划分，长江以北诸路划归河南行省，原荆湖北道宣慰司辖下辰、沅、澧、靖、归、常德等路属湖广行省^⑤，同年自云南行省境内通往湖广行省境的東西向驿道也初步建成，该驿道的设立始自至元二十七年四川行省上奏，请将云南通往大都驿道改由穿湖广行省境内北上，此前云南境内普安路以及湖广辰、沅、靖等路已有站道，在四川省境设立各站，将三省驿道相接，两年后随着东西向驿道的落成，元廷还准许于湖广境内设置岳州而至镇远的马站与水站。^⑥ 同样基于交通驿道的建立，湖广行省西部地区在与四川行省的辖区划分中取得包括八番顺元地区，以及思州、播州的管辖权。^⑦ 至元三十一年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司佥事张经上奏：“沅州正冲八番、思播，系边远重地，宜依旧为路，兼管靖州，仍于南州沅边诸寨设立巡检，及镇守辰、沅、靖上均州万户府官三员，各分镇守。诏从之。”^⑧ 虽然这一时期的靖州地区重归湖广行省治理之下，而由于元廷的战略部署主要投向八番与思州、播州，湖广行省境内驿道沿线地区的战略地位也随之改变，沅州路成为东西线的枢纽，元廷于当地

① 《元史》卷125《赛典赤赡思丁传》，第3065页。

② 参见陆韧：《元代安抚司的演化》，《历史地理》（第2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4—57页；[日]大岛立子：《元朝の湖広行省支配》，《東洋學報》第66卷，1985年，第152页。

③ 《元史》卷63《地理志六》，第1544页。

④ 参见《元史》卷63《地理志六》，第1527页；《宋史》卷88《地理志四》，第2197页。

⑤ 参见《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第358页。

⑥ 详见《经世大典·站赤三》，《永乐大典》卷19418，中华书局，2000年影印本，第7211页；《经世大典·站赤八》，《永乐大典》卷19423，第7253页。

⑦ 参见伍磊：《元初八番顺元地区管辖权变动问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3期。

⑧ 乾隆《辰州府志》卷12《备边考》，“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9册，第220页。

置万户府^①，靖州路则因偏居驿道支线，战略地位下降，加之靖州路人口较少，元廷进而改路为州，继而先后隶属于辰州路与沅州路。

元代湖广行省境内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历来是行省地方治理的重心，自湖广行省西部区划的完成，八番顺元宣慰司及其辖下的15处安抚司成为湖广行省少数民族区域的主要分治机构，宣慰司长官由朝廷委任，安抚司长官则通常委以归附之地的土酋，同时仍设达鲁花赤。而地方民族区域设置“蛮夷长官司”以土官为长，宣慰司、安抚司在直接管辖民族地区各长官司的同时对土官进行监理。元廷利用这种糅合区域与族群的方式达到对湖广境内民族地区的长效治理，也是基于元朝所奉行的民族政策中“因俗而治”原则以及在西南民族地区探索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特殊管辖制度。思州与播州于南宋时期便由当地土官田氏与杨氏家族把持，思州田氏与播州杨氏自入附元朝即被授以安抚司之职，但两处安抚司在湖广行省西部各安抚司中的地位又相对特殊，元廷允许两安抚司拥有自身兵力。元朝对思州与播州十分重视，至元年间元朝对缅甸、安南等周边地区的军事行动均征调思、播土兵。嗣后两地更设置宣慰司、宣抚司及安抚司，元廷对两地土官待遇甚厚，其辖区事务均由田氏与杨氏家族成员掌控，享爵位世袭，世守其地。^②

湖广东西驿道的开通加强了元廷对沿线土官辖区的掌控，湖广行省境内的区域秩序却也因此不断变化。元成宗时期地方土官宋隆济、蛇节发起对顺元地区的进攻是引发湖广行省区域秩序剧变的重要事件。大德四年（1300）元廷发西南三省兵力征伐八百媳妇国，时云南行省左丞刘深领兵取道顺元，右丞月忽难“调民供馈”，遂引发顺元路水东雍真葛蛮（今贵州省开阳县）土官宋隆济不满，联合水西蛇节等地方土官集结各地力量，对贵州（今贵阳市）、新添（今贵定县一带）以及北部播州发起进攻，并不断向周边蔓延。^③元廷动用了湖广、四川、云南三省联兵以及陕西军，思州、播州土兵，历时近三年平定。^④该事件不仅波及元朝西南三行省地面，更对湖广行省民族地区的治理产生很大影响。八番顺元宣慰司以及各安抚司辖区均遭受冲击，部分安抚司就此撤销^⑤，思州田氏与播州杨氏则因在这场冲击中坚定效忠朝廷，在元廷授意之下积极参与平乱，并在平定之后对各民族区域的重新招抚，使得两地军事实力在此过程中得以强化，其中思州田氏管辖范围也在不断向行省东部地区进行拓展。至元十八年（1281）元廷“改思州宣抚司为宣慰司，兼管内安抚使”，嗣后又对思州田氏内部职司进行过分化^⑥，对比成书于元成宗大德年间的《大元混一方輿胜览》以及《元史·地理志》，播州与思州所辖蛮夷长官数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尤其《大元混一方輿胜览》所记思州军民宣抚司所辖蛮夷长官43个，但到《元史·地

① 参见温海清：《元代江南三行省“万户路”问题析考——江南镇戍制度的另一个侧面》，《文史》2018年第1辑。

② 参见《元史》卷8《世祖纪五》，第171页；《元史》卷9《世祖纪六》，第192—193页；陆韧：《元代湖广行省溪洞地理环境下的蛮夷官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1辑。

③ 详见佚名著：《招捕总录》，“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911册，第15页。

④ 参见黄滔：《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赠推恩效力定远功臣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国追封齐国公谥武宣刘公神道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5，“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1469册，第253页。

⑤ 参见刘兴亮：《元代湖广行省西部民族地区建置沿革考》，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78—92页；成臻铭、张科：《湘黔滇古驿道开通对元代湖广土官社会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

⑥ 参见《元史》卷11《世祖纪八》，第233页；《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第362页；思州田氏职司及其分化参见叶成勇：《关于贵州岑巩县木召古城的再认识——兼论思州田氏土司治所之变迁》，《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第3期。

理志》思州军民安抚司条所记已有 70 余州、县、寨及蛮夷长官司。^① 虽然其中多处地望现已无从详考，从中却也能够看出当时的思州田氏势力在不断向行省中部、东部地区延伸。

这一时期的靖州地区也再度迎来地方秩序的转变。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自至元年间设置于古州地区，并管辖靖州西南大半民族地区的古州八万军民总管府被废，史载并未述及原因，但此后元廷又于当地又设置了潭溪、龙里、八舟、曹滴、古州八万洞、诚州富盈、福禄永从、铜鼓、湖耳、亮寨、欧阳、新化、赤溪南洞、中林验洞、洪州泊里等 15 处长官司，均受思州安抚司管辖，与此同时靖州再度由州升为路，并自此成为定制。很显然这一系列的建置变更应是受宋隆济等动乱影响区域局势的动荡，一方面与之毗邻的靖州战略位置再度显现，但以靖州有限的人口与兵力稳定少数民族区域尚存在困难，于是默许了思州安抚司对少数民族地区招抚范围的不断扩大，思州田氏深得元廷重用，相较于对土官职权的掌控，这一时期边疆民族地区动乱的平息更为元廷所重视。

二 元顺帝朝洞民划境靖州路辨析

《元史·顺帝纪》记载后至元四年（1338），元廷将湖广行省中部，今黔东南地区洞民改隶靖州路：“湖广行省元领新化洞、古州、潭溪、龙里、洪州诸洞三百余处，洞民六万余户，分隶属靖州，立叙南，横江巡检司。”^② 近人柯劭忞在《新元史》中保留并补充了这则史料：“后至元四年古、潭溪、龙里、洪州诸洞三百余处，洞民六万余户，分隶清州、中古州、洪州。均隶思州安抚司。龙里则隶管民总管府。至治二年，置中古州乐墩洞长官司。”^③ 《元史》的记载本身并不难理解，但柯氏所记洞民的改隶范围却与之有较大出入，对此我们需要进行辨析。

关于《新元史》所据史源今已难详考，需要指出的是柯氏对后至元四年（1338）洞民区域更隶的记述的确存在一定问题。例如记述“龙里则隶管民总管府”，元代湖广行省境内存在两处龙里，一处位于今贵阳市以东龙里县，元代属管番民总管府。^④ 一处则位于今黔东南黎平县以北，元置龙里蛮夷长官司，属思州安抚司。^⑤ 两地东西相隔甚远且隶属不同，柯氏显然混淆了龙里的方位，误以为黔东南地区龙里蛮夷长官司曾隶属管番民总管府。再如记述诸洞“分隶清州”，有元一代湖广行省境内并无“清州”之置，历史时期仅位于今贵阳西部的清镇市在唐、宋时称“清州”，为黔中地区羁縻州之一，但元初其地划入普安路（治今贵州黔西南普安县境内），大德七年（1303）改为曾竹等处，属顺元等路军民安抚司管辖^⑥，断无遥领湖广行省中部地区的可能，自为柯氏疏漏。而从空间地理来看此处“清州”实为“靖州”的误写，黔东南洞民区域历来与靖州路毗邻，湖广行省中部包括靖州、沅州、辰州、武冈诸路虽为路州单位，境内亦多民族杂居：“县控制溪洞，蛮獠杂居，抚字稍乖，辄弄兵犯顺。”^⑦ 靖州自至治二年（1322）再度改州为路，以靖州路对与之相毗邻的洞民地区实施管辖是合乎逻辑的。

① 参见刘应、李原编，詹有谅改编，郭声波整理：《大元混一方輿胜览》卷下《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54—658页；《元史》卷63《地理志六》，第1546—1553页。

② 《元史》卷39《顺帝纪二》，第844页。

③ 《新元史》卷51《地理志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标点本，第1325页。

④ 《元史》卷63《地理志六》，第1543页。

⑤ 参见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7《黎平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巴蜀书社，2006年，第1册，第78页。

⑥ 参见《宋史》卷89《地理志五》，第2226页；《元史》卷63《地理志六》，第1545页。

⑦ 《元史》卷182《欧阳玄传》，第4196页。

但在翻阅相关史料时一则材料仍引起笔者注意，据现存黔南《田氏宗谱》的记载：

茂烈，字伟功。初授思南宣慰使。至正时，古州八万苗夷叛逆，公命部僚张应隆、应铭弟兄领兵攻之，有功，保任应铭授武功承节郎。

仁厚，字公淳。授思州军民宣抚使。时值伪夏威逼，民困于转运，兵疲于御侮，公以武功靖乱，加朝烈大夫管古州八万军民事。^①

前文已述，自元廷罢古州八万军民总管府，在行省中部洞民地区陆续设立了15处蛮夷军民长官司，均位于今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内。其中，“古州”建置有两处地方，一处位于今黎平县以北，称外古州；另一处位于黎平县以西榕江县一带，称里古州，亦称中古州。民国《贵州通志》对此考证亦值得注意：

宋时古州治此，土人呼为里古州。其北三十里又有古州屯。《黔记》里古州在黎平西南、而古州屯在其北三十里，与《明一统志》称古州八万洞在黎平西六十里之文相证，可知古州八万洞即古州屯，亦即外古州。以其远于融州，较中古州多三十里，在黎平西，与其在西南异也。^②

思州田氏子弟曾分掌思州宣慰司、宣抚司及安抚司之职，并长期控御古州地区^③，《元史·地理志》亦将15处蛮夷长官司列入思州安抚司辖下。但《田氏宗谱》的记载似乎表明到元顺帝至正年间，思州田氏的控御重心仍在湖广行省中部，黎平以西古州地区仍由思州管辖，这便与《元史·顺帝纪》的记载相抵牾。而考察元末明初这一地区局势的转变，或能为辨析《元史》与《新元史》相关记载的出入提供一些线索。

《明太祖实录》记载至正二十五年（1365）正月“靖州军民安抚司”率先入降朱元璋麾下徐达军^④，七月“元思州宣抚使兼湖广行省左丞田仁厚遣其都事林宪、万户张思温，来献镇远、古州军民二府，婺州、功水、常宁等十县，龙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皆其所守地也。于是命改宣抚司为思南镇西等处宣慰使司，以仁厚为宣慰使”^⑤。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古州地区乃作为思州辖境，一定意义上佐证了《田氏宗谱》所记元末思州田氏仍辖古州地区属实。《明太祖实录》记载黔东南诸洞于洪武三年（1370）归附明朝，相关记述颇详：

洪武三年春正月庚戌，湖广辰州湖耳洞长官杨秀荣、潭溪长官石文焕、新化长官欧明、万平江蛮夷军民长官杨晟明、欧阳寨长官杨再伸等来朝，贡马及方物。初，辰州卫指挥副使刘宣武率兵克平古城等寨，招降湖耳、潭溪等处洞官，至是来朝，纳元所授宣敕印章，上赐以冠服。既而湖广省臣言：“五寨系靖州地，与广西融州、思、播接壤，元时置五处长官司

① 陈国安：《（黔南）田氏宗谱摘抄》，向零等编：《民族志资料汇编》第9集《土家族》，贵州省志民族志编委会（内部资料），1989年，第357页。

② 民国《贵州通志·舆地志四》，“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巴蜀书社，2006年，第6册，第71页。

③ 参见叶成勇：《关于贵州岑巩县木召古城的再认识——兼论思州田氏土司治所之变迁》，《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第3期。

④ 《明太祖实录》卷16，元顺帝乙巳年正月己巳，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215页。

⑤ 《明太祖实录》卷17，元顺帝乙巳年七月乙丑，第237页。

以辖洞民，乞仍其旧制。”诏从之，于是复立湖耳、潭溪、新化、欧阳、古州及八万亮寨六处蛮夷军民长官司，秩从五品，隶辰州卫。^①

《元史》记载顺帝至正九年（1349）元廷罢靖州路，改为靖州军民安抚司，并设万户，增戍兵。^②至正二十五年靖州与思州虽先后入降徐达、常遇春大军，但其只完成了对行政中心区域的控制，并未立即展开对当地少数民族的招抚。靖州入降之初曾一度废置。洪武三年（1370）正月由辰州卫负责出兵招降该地区洞民，五寨长官进献元朝所授官印以表示正式入附明朝。另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是年三月明廷设置靖州卫，命指挥同知、佥事诸职官筑城戍守，以统湖耳等处土官。^③仅从《明太祖实录》记述来看，自五长官入朝，明廷复立湖耳、潭溪、新化、欧阳、古州、八万亮寨6处蛮夷军民长官司，“平江蛮夷军民长官”之设不见于《元史》，以元代晚期该地区诸长官司时设时废，到明初长官司数量与名称并不固定^④，不排除为元末设置的可能。湖广省臣上报明廷时称“五寨系靖州地”，《元史》所记无误，结合《新元史》的记载亦可见，元顺帝后至元四年（1338）元廷将这一地区分别划归靖州路与思州安抚司。^⑤其中，湖耳、新化、潭溪等位于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部、东北地区蛮夷军民长官司所辖洞民划属靖州路，而中古州大部，乃至洪州泊里等洞长官所控南部洞民则划属思州。此次划境表面来看仅是对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行政隶属的变更，当地洞民的管辖模式并未因此而改变，而从分化后的格局则不难看出，元廷此举实际上削减了思州安抚司对这一地区的掌控，其辖境与靖州路亦在该地区呈犬牙交错之势。

三 思、靖“犬牙相制”与地方治理

元顺帝一朝，湖广行省地方治理面临诸多问题。一方面地方官民矛盾不断激化，武冈一带徭民对时任武冈县尹的欧阳玄抱怨：“吏更需求无已，徭役横敛，掙克百端，使终岁劳苦，无以为生。情有不堪，发愤就死耳。”^⑥不唯地方吏治的腐朽，出任湖广行省的官员更无意勤政于这一地理、族群分布皆复杂于中原的区域，如马祖常所言：“中州大夫士吏南越者，往往不乐其土。其仕皆有苟且而无忧勤之心，以其故政事懈弛，莫致其治教之意。而蛮民与徭合盗，广西数郡罹其暴。”^⑦元顺帝即位之时湖广行省多个地区爆发徭民对地方官的攻击^⑧，静江路儒学教授李震孙记录了时局的不安：“岂若此寇，转攻化地数千里，遣毒蛰生灵，三十年士卒，肝胆脂草野，藩臣边将死难，项背相望。”^⑨元顺帝亦对广西地方形势格外关切：“元统初，元圣天子远念南

① 《明太祖实录》卷48，洪武三年正月庚戌，第958页。

② 参见《元史》卷140《达识帖睦迺传》，第3375页。

③ 《明太祖实录》卷50，洪武三年三月丙辰，第984页。

④ 参见廖耀南：《黎平锦屏从江长官司考略》，《贵州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

⑤ 点校本《新元史》该条史料标校值得商榷，可作：“后至元四年古、潭溪、龙里、洪州诸洞三百余处，洞民六万余户，分隶（清）〔靖〕州。中古州、洪州均隶思州安抚司。”“清州”为“靖州”误写。

⑥ 危素：《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光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圭斋先生欧阳公行状》，《危太仆文续集》卷7，“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影印本，第7册，第562—563页。

⑦ 马祖常：《送雅琥参书之官静江诗序》，《石田先生文集》卷9，“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景至元五年扬州路儒学刻本，第94册，第252页。

⑧ 详见《元史》卷38《顺帝纪一》，第819、820、821页。

⑨ 广西民族研究所编：《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2—143页。

岭飞龙旧藩，欲俾郡生脱艰虞而臻平康，命建屯，选将遣才。”^①当时元廷征调了河南、江浙、湖广三行省以及八番义从军、各地乡勇等多方兵力平定“徭乱”，广西东部静江、贺州，湖南道州、武冈等地都受到冲击。

在如此边疆局势之下，靖州地区同样为元廷所格外关注，顺帝元统元年（1333）鲁明善出任靖州路达鲁花赤，鲁明善为元代著名畏兀儿农学家，早年曾于内廷任必闾赤，得元文宗器重，后鲁明善使佐江西行省狱讼并开启半生地方仕宦之路。虞集曾为鲁明善撰写《靖州路达鲁花赤鲁公神道碑》，相关碑文为我们提供了后至元四年黔东南洞民改隶的重要线索：

丞相欲留为某部郎官，公叹曰：“吾老而贫，得一小郡以治，斯足矣。”乃得靖州。靖迫西南夷，公至，不严而化。然五溪故地千八百里，有山溪之险。靖所领也，及田氏内附，湮侵而有之。公曰：“此则不可不治，他日无穷之害也。”乃画地图、考案牒、究其岁月定地，犬牙相制。状上诸行省以闻。三月不报，公曰：“吾得言之矣，行不行，天也。”乃解组还太平，逍遥山水间，挥五弦而叠飞鸿，遂终其身矣。^②

鲁明善曾先后出任寿春、安丰、太平、池州等六地总管与达鲁花赤，拥有非常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③待鲁明善到任靖州时距离当地于至治二年（1322）再度改置为路已过去11年，但地方局势仍难以安定。据鲁明善考察认为思州的不断东扩乃“他日无穷之害”，虞集对思州辖境的扩大亦称“湮侵而有之”，而“湮侵”一词更表达一种忧患意识。虞集虽于顺帝即位初便告病还乡，却仍得顺帝器重，“屡有敕，即家撰文，褒锡勋旧、侍臣”^④。一定意义上虞集用词所表达的也是元廷的意见。

赫尔曼（John Herman）指出蒙古西南征服所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当地政治边境、行政管辖与制度关系的建立令元廷政治精英视这片区域为元朝的一部分。^⑤元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虽仍凭借各地土官进行治理，但其权力仍在行省以及宣慰司节制之下，同时各地土官还需不定期入朝供奉，这种联系很大程度上增进了各地土官的国家认同，保障元朝对西南民族地区的长效治理。然而湖广行省境内民族地区的复杂性尤其体现在土官辖区与路州分界并不清晰，容易成为湖广境内地方矛盾的焦点。如广西庆远南丹安抚司以及来安路、镇安路岑氏与上思州黄氏土官所辖区域与静江路、融州、南宁路、梧州路等直隶行省区域一度矛盾丛生。岑、黄二姓土官与思州田氏、播州杨氏一样官衔世袭，相较于思、播历来受元廷重用，“两广岑黄”则在与邻近路州不断的地方争斗中与元廷对抗。^⑥这对于广西地方的“徭民”影响较大，尤其到元代中后期，静江等路辖区境内的徭民则在不断激化的官民矛盾中引发动乱。

湖广地面的复杂性亦使元廷不断调整对西南边疆民族区域的策略，尤其对各地安抚司与土官的态度。事实上对于思州田氏在湖广行省中部地区的辖境扩展，仁宗时元廷也曾授意湖南西水流

① 广西民族研究所编：《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第142—143页。

② 虞集：《靖州路达鲁花赤鲁公神道碑》，《道园类稿》卷52，“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6册，第311页。

③ 参见尚衍斌：《元代畏兀儿农学家鲁明善事迹再探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2期。

④ 《元史》卷181《虞集传》，第4180页。

⑤ John Herman, *Amid the Clouds and Mist: China's colonization of Guizhou, 1200 - 1700*,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69.

⑥ 参见佚名著：《招捕总录》，“丛书集成初编”，第3911册，第17页。

域设立永顺与保靖安抚司。两处安抚司在助元军平定沅州、辰州等地吴千道等人之乱中逐步兴起^①，即已限制了思州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而顺帝之初，广西“徭乱”于后至元三年（1338）三月在江南多地联合兵力攻势下溃散。五月，元廷诏“给平伐、都云定云二处安抚司达鲁花赤暗都刺等虎符”。九月，“立四川、湖广、江西、江浙行枢密院”^②。相关举措传达出的讯息亦即元廷开始逐步收紧对湖广行省境内的军政管控。针对播州杨氏与思州田氏这样的地方土司势力不断扩大，元廷的态度则更为谨慎，虽然并未收归其两土司军政之权，却也由重用转为节制，尤其在与靖州划境洞民辖区的问题上，后至元四年诸洞行政隶属划分的结果也表明元廷最终采纳了鲁明善的建议。

从后续史实来看，靖州路及其周边区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得以安定。直至至正六年（1346）“徭民”吴天保发起对靖州地区的进攻，《元史·顺帝纪》则记之为“思、靖徭寇”，其一路陷靖州、沅州、武冈等地，再度打破了稳定。到至正九年，元廷在行省中部分置三省，一治静江，一治沅、靖，一治柳（今柳城以南）、桂。罢靖州路总管府，改立靖州军民安抚司，设万户府。^③沅、靖分省及靖州安抚司之设，自然指向对黔、湘、桂三地民族区域的进一步管控。而在整个平乱期间，思州除对古州地方动乱的平定^④，辖境也再未向东扩展，元廷也并未再度动用地方土官力量进行大规模镇抚，而是进一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军事布防，在靖州、武冈等地广立义兵千户所以稳固局势。

结 语

元代靖州路由于辖境毗邻少数民族地区，相对于一般路州，在湖广行省地方治理中的地缘位置较为特殊。元朝所开创的土司之制将民族与区域进行糅合，与一般地方行政以户籍为基础的治理有所区别，湖广行省地方治理中多存在这样的二元结构。湖广行省辖区广袤，境内族群杂处，土官辖区与路州行政区域并非泾渭分明，随着民族地区矛盾以及秩序的不断变化，行省地方治理的二元结构也在运行过程中不断碰撞，靖州路与思州安抚司的划境即是其中典型。而伴随着土官势力的不断发展，元廷亦有意在地方治理中调整并利用二者之间的相互制约，在加强中央对地方行政权力掌控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为当时湖广行省区域秩序的稳定带来了平衡。这一地方治理策略在明代也得到某种程度的延续。明代靖州及湘黔交界地区的治理曾经历多番变动，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尤其黔东南地区则呈现黎平府、新化府所辖湖耳、潭溪、龙里等蛮夷长官司与五开卫、铜鼓卫建置的并存，各方犬牙相制的区域政治格局，同样是为巩固地方治理所做出的不断调整。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责编：周 全 宿万涛

① 参见成臻铭：《论湖南元明时期的土司——兼与新添葛蛮安抚司在湖南论者商榷》，《民族研究》1996年第5期。

② 《元史》卷39《顺帝纪二》，第839—840页。

③ 参见《元史》卷140《达识帖睦迺传》，第3375页。

④ 参见陈国安：《（黔南）田氏宗谱摘抄》，向零等编：《民族志资料汇编》第9集《土家族》，第357页。